

第二十一章

功業文章



水

嶺即座

諸軍勦滅

係同治乙丑

曾國

說到曾國藩對後世的影響，可以舉出很多個方面。他一生做的事很多，但最大的事情只有兩件，一是創辦湘軍鎮壓直至平滅了太平天國，一是舉辦洋務事業。所以，他最大的影響也就來自這兩方面，即第一挽救了清王朝的統治，平滅了太平天國；第二創辦近代化事業，有人甚至稱他為「中國近代化之父」。這兩件最重要的影響我們在各章中都已敘述過，我們這裏從其他的角度上談曾國藩對後世比較重要的影響。

一、經世求變，近代儒宗

對於一百年（1840—1949年）的中國近代史來說，處於開端初期的曾國藩的一生活動，意味着什麼呢？我們用一句話概括：近代儒宗。

馬克思曾稱文藝復興時的偉大詩人但丁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，也是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。模仿這句話，我們可以說，曾國藩是舊時代的最後一位儒家，也是步入新時代——大動盪、大轉變時代的一位儒家。

儒家創自孔子。孔子生當動盪的春秋時代，那時候周室衰微，天崩地解，異端並起，與近代中國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。孔子要實現他教化天下的願望，要把他的學說理想付諸實施，為此他致力研究各種學問，又栖栖惶惶地奔走諸國。他的事業雖然並不成功，但他的入世精神卻成為一種價值取向，與當時的道家、後來的佛家相對。另一方面孔子也有深刻的人格追求，用後人的話來說，是外王與內聖並重。

孔子之後，儒家學說的繼承人有荀子和孟子。荀子重外王，即事功；孟子重內聖，追求做聖人。以後秦漢至隋唐，儒家學說升到思想界的統治地位，儒家的繼承者們實是將內聖外王並重。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以後，一方面是儒家佔統治地位，同時另一方面儒家吸收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說。所以後世雖獨尊儒家，但儒家實已將先秦各家學說的精華吸收。

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，文化燦爛。儒家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體，所以所謂文化燦爛，儒家自應佔有較大的一份。但是不容否認，儒家雖有入世的精神，然而卻常常教導人向後看，從古聖先賢那裏尋找治理現世的答案。所以，中國漫長的中世紀社會發展的緩慢，儒家也要負較大的責任。到了宋明理學，援佛入儒，儒家思想更為細微精緻，卻也更為保守。理學家們不務實際，他們聲稱由求內聖可以達到外王，但實際上變成只求內聖而忘了外王，也就是忘了孔老夫子的入世精神。一遇危難，往往束手無策，只有一死以報君恩。

明末清初，儒學又有一大變化，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等人批判君主專制，批評宋明理學，他們的思想有打破傳統束縛，邁向新時代的勢頭。可惜他們的思想沒有為學者們繼承，三大思想家之後的學者，一部分仍陷入已經提不出新東西的宋明理學的泥潭，另一部分則扎進考訂古籍的漢學之中。

直到清中葉以後的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才興起了主張經世致用、努力解決國計民生大問題的一班知識分子，這就是本書前面所說過的陶澍、林則徐、龔自珍、魏源等人。接着又興起了第二代經世派讀書人，這就是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湘軍領袖。

從陶澍、林則徐、魏源到曾國藩，儒家又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變化。第一，他們恢復了儒家兼收並蓄的傳統，不再囿於一說。黎庶昌為曾國藩作年譜時說，曾國藩「平生以宋儒義理為主，而於訓詁詞章二途，亦研精覃思，不遺餘力。處功名之際，則師老、莊之謙抑；持身型家，則效禹、墨之勤儉」，比較準確地概括了曾國藩兼收並蓄的傾向。第二，他們恢復了儒家入世的精神，也就是經世致用的精神。這恐怕是儒家自漢、宋兩次大變之後的又一次大變。正是在這種變化的基礎上，曾國藩才能將西方的技術和科學（與兵工、強國有關的科學，並非整個科學體系）引進中國。從而帶來了儒家更大的變化。這種變化，部分是外來壓力刺激的結果，部分是經世致用學派發展的必然趨向。

但是，時代不同了。漢以後儒家吸收先秦其他學派的思想、宋以後儒家援佛入儒，那些被吸收的思想與儒家都是同一個時代的，因此，吸收以後的結果是豐富了儒家思想，但並不從根本上改變儒家思想體系。而曾國藩所吸收的西

方技術也好，引進的科學也好，建起的機器工業也好，都是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近代社會的產物，與儒家學說是不同質的東西。這些東西一旦被吸收進來，就不再僅僅是補充或豐富儒家的思想，而是隨着社會的變革，不斷衝擊和蠶食儒家的思想和陣地。在這種衝擊和蠶食之下，儒家支離破碎，到了新文化運動時候，甚至已經名譽掃地了。所以，曾國藩以後，中國吸收西學的傾向已經勢不可止，許多人都比曾國藩吸收和引進西學更多，但是，他們已經難說是真正的儒家了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說曾國藩是近代儒宗。

近代儒家不止曾國藩這樣的吸收西學一種取向，還有另外一種取向，那就是抱殘守缺，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，堅決反對用夷變夏，反對吸收西學，希望重新回到過去的閉關鎖國時代，恢復天朝上國的舊夢。與曾國藩同時的倭仁、曾國藩以後的徐桐，就是後一種取向。這種人勢力和社會影響也不小，只是隨着社會的變革而日益沒落。

總之，曾國藩是近代儒家的代表，他試圖引進西學光大儒學，代表了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在新時代的一種價值取向，卻在不知不覺中破壞了儒學體系。

二、兵為將有，外重內輕

曾國藩對軍制的第一大影響，是湘淮軍、其他勇營及仿效湘淮軍的練軍取代了綠營。

中國任何一個朝代，對內要鎮壓民眾的反抗，對外要防禦外敵，都要供養龐大的軍隊。清代在太平天國起義以前，國家的正規軍（當時一般稱「經制之兵」）是八旗和綠營。八旗兵二十多萬，部分駐於京師，叫京營；部分駐於全國各戰略要地，稱駐防。綠營兵六十多萬，分散駐全國各地。滿清初入關時，八旗兵鐵騎曾橫行天下，幾無敵手。其後綠營兵在征討西北等地的叛亂中，也曾立下赫赫戰功。但是，到了太平天國揭竿造反的時候，無論是八旗還是綠

營，都已不中用。

軍隊無用的原因，部分是由於承平已久，沒有殘酷戰爭的壓力，缺少訓練，沒有作戰經驗，軍隊沒有好軍官。但深層次的原因、根本的原因，是制度上的。八旗兵全由滿族人組成。清代的制度，滿族人不事生產，原則上成年男子都是士兵，是一種世兵制，在清初統治者的想法，是要以此來保證作為征服民族滿族在軍事上的優勢。然而不料不事生產的滿族士兵，由於世代養尊處優，已經完全失去了戰鬥力，失去了作為軍隊的功能，只是清朝統治的一種象徵而已。所謂「八旗子弟」，幾乎已成了無所事事、游手好閑而又無才無德無能的公子哥一類人物的代稱。

綠營兵是太平天國造反前清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裝力量，但是這支武裝力量的制度又是極不合理。

首先，綠營的駐防地十分分散。我們今天看到的軍隊常常整團整師駐紮在一處，甚至一個集團軍集中駐紮一地。平時集中訓練，一旦有戰事發生，可以整師整軍甚至整集團軍迅速調動。今天駐紮北京的部隊，當有保衛國家的需要，執行任務時，南可以到廣東，北可以到黑龍江，西可以到新疆。但是綠營絕對做不到，綠營常常十幾名、幾十名甚至只有幾名駐紮一處。戰略要地也不過上千人而已。這樣的軍隊根本沒有機動能力，一旦有大規模的戰爭也根本不能形成戰鬥力。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，從各省抽調軍隊到前線，結果各省是此處抽十名，彼處抽數十名，拼湊出來的軍隊怎能打仗？

綠營的第二個問題，是軍官。雖說提督、總兵、副將、參將等都算是職業軍官，但真有重大戰事的時候，朝廷都要另派重臣作總指揮。而這位重臣並不一定懂得軍事，配給他的下屬軍官也許和他從未見過面。這位總指揮不知道哪部分軍隊善攻，不知道哪部分軍隊善守，不知道手下各部戰鬥力如何，叫他如何指揮打仗？由於綠營的駐紮和調遣方法，總指揮手下的將和兵也互不相識，真是將不知兵，兵不知將，帥不知將，將不知帥。

綠營的第三個問題，是極其腐敗，這也是基於第一個問題產生的。驕橫、懶惰、游手好閑都還不算，更為嚴重的，是許多人吸食鴉片；又有許多人雖在

兵籍，打仗時卻僱人代替。至於其他問題，如基本上沒有訓練，沒有演習，等等，都是習以為常的事情。所以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，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，綠營多是一遇敵即一敗塗地。

曾國藩初創湘軍時寫給李鴻章的信，道出了綠營作戰的實際狀況：

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，莫大於「敗不相救」四字。當其調兵之時，東抽一百，西撥五十，或此兵而管以彼弁，或楚弁而轄以黔鎮，雖此軍大敗奔北，流血成淵，彼軍袖手而旁觀，哆口而微笑。此中積習，深入膏肓，牢不可破。

關於綠營的弊病，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鴻章等湘淮軍領袖之間，曾無數次討論過。曾國藩創辦湘軍，針對綠營的這些問題作了巨大的多方面的改革，克服了綠營的弊病。這在本書前面已經介紹過，這裏不再重複。總之經過曾國藩的改革，名義上只是地方民兵的湘軍，變成了可以隨時徵調各地作戰的野戰軍。其戰鬥力大大超過了綠營，得以最後擊滅太平天國。

但是這樣一來，湘淮軍與綠營對比之下，更顯出了綠營的腐敗和無能。自湘軍產生後，明裏暗裏和綠營發生過不少矛盾，但是終究因為綠營沒有戰鬥力，而使湘軍站穩了腳跟，並且逐漸排擠綠營的地盤。早在 1864 年初，當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奏請將浙江綠營一律裁撤。既然有此開端，曾國藩也趁勢將安徽省的綠營兵裁撤。以後也有不少省份將無用的綠營裁撤。

清代咸豐、同治以前，也曾有過招募勇營的事情，但事後都予以裁撤。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結束後，雖然也曾裁撤部分湘淮軍，但因為綠營無用，清政府要對內控馭和鎮壓反叛，對外要防禦列強的侵略，所以相當多的湘淮軍特別是淮軍保留了下來。保留下來的湘淮軍統稱為「防軍」，終於成為國家的正式軍隊。防軍不僅包括湘淮軍，也包括其他各省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按湘軍制度招募的勇營，但以淮軍、湘軍為主。綠營的部分精壯則被抽出編練為練軍，曾國藩當直隸總督的時候，就下過功夫制定訓練練軍的條例章程。所以捻軍戰爭以

後，清朝的軍隊以防軍和練軍為主，綠營逐漸消亡。甲午戰爭，與日軍作戰的即主要是防軍和練軍。

曾國藩對軍制的第二大影響，是造成了軍隊中的私人隸屬關係。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先生把這種現象稱為「兵為將有」。

綠營兵是世代為兵，將領全由朝廷任命，兵權完全控制在朝廷手中。士兵與將官之間，下級將官與上級將官之間，不會發生私人隸屬關係，當然這也是綠營敗不相救的原因之一。湘淮軍一改綠營制度，統領由大帥（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鴻章）選派，營官由統領選派，營官以下依此類推。因為士兵和下級軍官有着私人關係，下級軍官和上級軍官有私人關係，打起仗來，士兵死命保護招募他來軍的軍官，下級軍官完全聽命招募或提拔他的上級軍官，全軍聽命於大帥，而曾國藩更為全軍的核心。這樣克服了綠營敗不相救的弱點，但同時也就造成了私人性質的軍隊。1857 年，曾國藩丁父憂家居，離開了軍隊，名義上已不是湘軍統帥，但是湘軍將領自胡林翼以下，李續賓、李續宜、楊載福、彭玉麟無不仍視曾國藩為湘軍的最高領袖，重大的事情常向在湘鄉的曾國藩彙報並請示機宜。

曾國藩也好，李鴻章也好，還不能算是軍閥，他們創辦的軍隊雖然與他們有深厚的隸屬關係，但他們深受儒家忠君愛國觀念的影響，對清廷並無異心，同時清廷隨時可以用一紙詔書，剝奪他們的權力。創建和指揮軍隊雖然給了他們通向權力的捷徑，但他們並不是單靠軍隊。然而以後的發展，卻使軍隊的私人性質越來越突出。到了清末辦新軍的時候，拱衛京師的北洋新軍為袁世凱一手創建，軍官都是他的私人，北洋軍軍官士兵甚至到了只知「袁宮保」（即袁世凱），不知有朝廷的程度，北洋軍就成為真正的軍閥軍隊、私人軍隊，而非國家軍隊。這種趨勢是從湘軍開始的，所以羅爾綱先生稱之為「兵為將有的起源」。就曾國藩來說，他並非有意造成這種局面，後來還竭力避免這種局面的發生。但是既要克服綠營的缺點，又要在一個遠非法制的社會裏創建一支能打硬仗的軍隊，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。兵為將有從起源發展到後來的軍閥，這恐怕是專制制度造成的悲劇。

與「兵為將有」的現象相關，曾國藩和湘軍的崛起造成了清朝政治外重內輕的局面。中國自秦以後廢諸侯，實行中央集權制，但歷來有中央和地方權限的分割問題。地方權限過大，特別是地方長官同時擁有人權、財政權、軍權時，就會對中央朝廷造成威脅，如唐末的藩鎮割據。但假如中央給地方的權限過小，中央統得過死，地方就會缺少靈活性，而遇到意外的變故發生特別西和北方的少數民族攻擊中央王朝時，地方官難以統一調動人力、物力、軍力去應付，因此往往在戰爭中失敗，宋代就是如此。給地方權大些也好，小些也好，都是為了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，所以這些問題，可以說是君主專制制度本身帶來的，左不行，右也不行。在君主專制制度下，是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。

清入關以後，大體承襲明代制度，而又加上自己的特色。而中央集權較之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總督和巡撫作為地方行政長官，雖然權力似乎很大，但軍權、財權、用人權完全聽命於中央。甚至一個小小的知縣的任命，也要經過中央。但是，從曾國藩及湘軍開始，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

首先說財權的下移。咸豐以前，中央對地方財政控制很嚴，不僅戶部總攬財政，還通過派到各省的布政使直接管理財政，布政使並非督撫的屬員，而是直屬中央，分割督撫的權力。再加上嚴密的報銷制度，督撫很少有未經中央同意自己運用處理財政的空間。清代的財政制度，自康熙年間規定「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」以後，雖說一定程度減輕了人民的負擔，但也使財政制度缺乏彈性，即需要大筆財政開支時中央難以應付。

太平天國起義以後，中央財政極為困難，根本無力支付巨大的戰費，各省督撫只好自想辦法，這叫做「就地籌餉」。於是勸捐的、出賣官銜的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而最有效也為後來長期應用的辦法，是厘金。而所有這些新辦法，其實行者、經手者都是督撫。錢既是督撫籌來，便也就歸督撫自己用，最多向朝廷報告一個數目，至於這些數目確切與否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問題還不到此為止，錢由督撫籌，督撫對地方財政的控制權越來越大，而布政使漸漸地實際上變成了督撫的屬員。

第二說用人權的下移。太平天國所到之處，清朝地方政權隨之瓦解，而在

緊張的軍事鬥爭中，清廷已不能再堅持實行以往的讓地方官員互相牽制的政策。所以任命督撫以下的官員，多由督撫自己推薦。久而久之，地方上管用人權和財政的布政使、管司法的按察使，甚至管兵的提督，都事實上成了督撫的屬員。而這些職位本來是分割督撫權力、防範督撫不軌行為的。隨着湘軍作戰的成功，隨着湘軍統帥和將領出任各省督撫，便把這種新的慣例帶到了各省。不僅督撫自己所在的省份的官員由自己推薦，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，清政府任命江蘇巡撫、江西巡撫、安徽巡撫、甚至閩浙總督、兩廣總督，都要徵求曾國藩的意見。曾國藩確實發現和提拔了大批人才，但由他一個人薦引的地方官遍及全國，形成了湘淮系的大網絡，卻是大清朝以前所從未有過的。

即以曾國藩去世的1872年為例，直隸總督李鴻章、兩江總督曾國藩、陝甘總督左宗棠、湖廣總督李瀚章、浙江巡撫楊昌浚、江西巡撫劉坤一、廣西巡撫劉長佑（後曾任直隸總督）、稍後任江蘇巡撫的張樹聲，都出自湘淮系，幾乎佔了各行省的一半。曾國藩已經意識到這種情況的危險性，他也曾為此感到不安。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發動北京政變後，命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，曾國藩不敢應命，他上奏說：「臣一人權位太重，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，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。機括甚微，關係甚大。」

曾國藩雖對內輕外重的趨勢抱有警惕，但要辦事，特別是生死互搏的戰爭，又必須一定程度集中權力，並且戰區各將帥和地方官需要密切配合，還是需要自己得心應手的人做下屬。曾國藩初任兩江總督時，胡林翼叫他「包攬把持」，用意正是在此，曾國藩雖說不敢包攬把持，但幾年之內，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的巡撫、布政使還是換上了湘系人物。如此形成的督撫用人權的坐大，曾國藩即便警惕並有意避免也是無可奈何，因為現實殘酷的戰爭需要如此。

第三是軍權的下移。

咸豐朝以前，按規定地方督撫有統帥本省軍隊之權，但又有提督分割其軍權。而有大规模戰事的時候，朝廷一般會從中央直接派統帥領兵作戰，戰費也由中央直接撥給。所以督撫控制軍隊的權力也就十分有限，一般恐怕只是直屬

於督撫的「督標」「撫標」數營而已。但自湘軍興起以後就不同了，兵由自己招，將由自己選，督撫的軍權大大增加。因為後來這些將大多變為督撫，所以羅爾綱先生所說的「兵為將有」，事實上也就變成「兵為督撫有」。

就這樣，經過太平天國一役，湘淮軍的成長，地方督撫的權力大大增加，用人權、財權、軍權合一。從前藩鎮割據的現象逐漸顯現出來。如本書第二十章所述，趙烈文在與曾國藩談話的時候，將這種趨勢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。並認為這種趨勢將導致清朝垮台後「方州無主，各自為政」的局面。

地方督撫權力的逐漸擴大，不僅對地方事務的發言權和控制大大增加，而且對中央事務的發言權也大大增加。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，慈禧太后及其圍繞在她身邊的保守勢力，企圖廢黜光緒皇帝。當時任兩江總督的湘軍領袖劉坤一立即表示反對，他說：「君臣之義已定，中外之口難防。」這話雖然委婉，但意思則非常堅決：我只認光緒皇帝是我的皇帝，如果換個別人當皇帝，別說我劉坤一不承認！而且，中國、外國不只你們這些人，不是你們所能一手遮天的！保守派當時雖然立了個大阿哥，但沒有敢公然廢黜光緒帝，與劉坤一的堅決反對有一定關係。因為劉坤一不只一個人，他背後有還具備一定勢力的湘系以及與湘系曾經關係密切的淮系。

地方督撫的權大了，中央的權當然就小了。1900年，八國聯軍進軍京津，清廷與聯軍交戰，也是兩江總督劉坤一，聯合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、兩廣總督李鴻章，實行「東南互保」，不聽朝廷交戰上諭，在他們的轄區與各國維持和平。所以1900年聯軍入侵，戰爭只限於直隸省和俄軍出兵佔領的東三省，其他省份都維持和平狀態，使這年的戰爭變成了局部戰爭。而在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攻的一段時間裏，不僅地方對中央抗命不遵，而且劉坤一和張之洞成了事實上的權力核心，在是否與聯軍交戰的問題上，各省多聽命於他們而沒有聽命於清廷。事情過後，清廷不但沒有責怪劉坤一和張之洞，反倒表揚這些抗命不遵的督撫。對於東南互保的評價，是學術界有分歧的問題，這個與本書關係不大，我們只是從這件事情上看到地方督撫的權威有多麼大。而這一切，可以說是從曾國藩和湘軍開始的。曾國藩並非有意造成這種情況，但客觀上確是如

此。他本想維護清王朝，但客觀上卻在無意之中削弱了清廷的權威，為後來清廷的垮台埋下了種子。

內輕外重局面是否可以挽回呢？太平天國和捻軍失敗後，晚清革命黨興起之前，有三十多年的國內和平環境，假如清廷有能力，也許可以收回這些權力。但是，清政府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。晚清最後十年，清政府在新政改革中，曾試圖削弱督撫手中的權力，只是這企圖不但沒有做到，反而加劇了中央朝廷與地方督撫的矛盾，加速了清朝的滅亡。

三、滿漢力量對比的變化

清朝是以少數民族滿族征服中原的形式建立的，自入關以來，滿族在政治上一直佔有特殊的地位。應該說，就統治政策而言，同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，清朝的統治政策比元朝要高明得多，它從未向元朝那樣把國人分成四等，而是宣稱各族人民一體對待，滿漢一家。雖然它實行過殘酷的文字獄，但也下功夫拉攏漢族讀書人。正因為如此，清朝才比元朝的壽命長得多（元朝統治全國只有不到一百年，清朝則自入關算起延續二百六十多年）。

但是話雖如此說，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它的統治，在設官任職上還是給予滿族以非常多的特權，使它的政權帶有民族征服的色彩。在中央，軍機大臣、大學士、各部尚書侍郎，名義上滿漢平分，但從來都是以滿族人為主。比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，軍機大臣六、七人不等，但為主的是滿族的穆彰阿。咸豐年間，軍機大臣常有變動，但咸豐帝最信任的是有皇族血統的肅順。

在地方，巡撫或漢族大臣佔多數，但權勢比巡撫高的總督向來是滿族佔多數。近代史上，除1907年以後東北三省改為行省也設總督外，一般是八個總督（漕運和河道總督除外）。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1840年，八大總督中滿族佔了五個，只有三個漢族總督，即兩廣林則徐、閩浙鄧廷楨、湖廣周天爵。